

新资料 新视角



正坊间之种种误传歪论

华语著作中第一部以战略学视野全面解读鸦片战争的力作

当天朝 遭遇帝国

大战略视野下的
万战争

王鼎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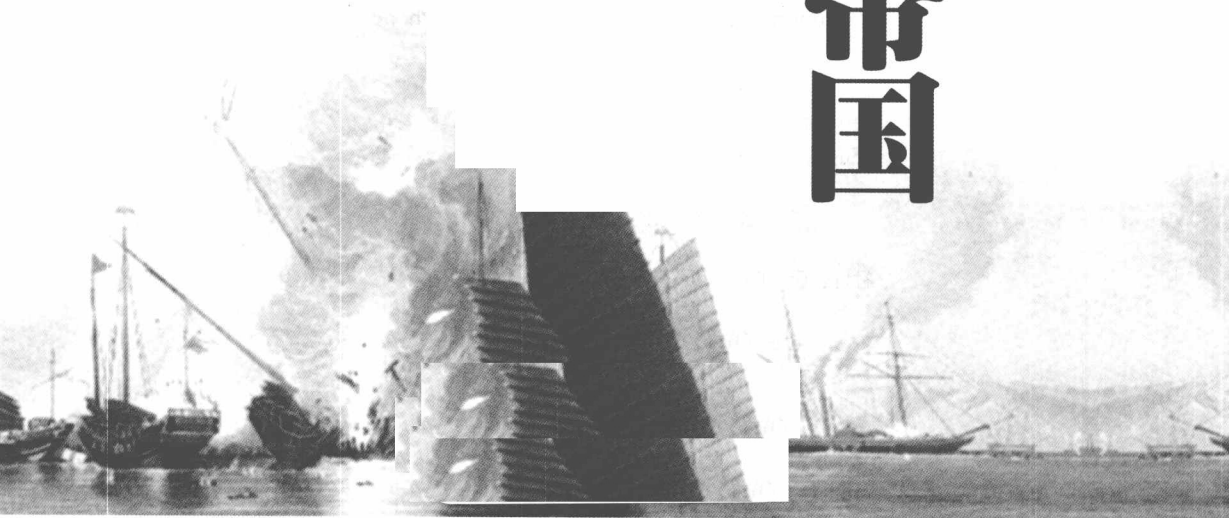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新资料 新视角

当天朝 遭遇帝国



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

王鼎杰◎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 王鼎杰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624-5555-4

I. ① 当… II. ① 王… III. ① 鸦片战争 (1840—
1842) —研究 IV. ① K25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37767号

当天朝遭遇帝国：

大战略视野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Dang TianChao ZaoYu DiGuo:

DaZhanLue ShiYeXia De DiYiCi YaPian ZhanZheng

王鼎杰 著

策划编辑：陈 进

责任编辑：文 鹏 夏 宇 版式设计：陈 进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A区) 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20 × 1020 1/16 印张：20.75 字数：404千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555-4 定价：3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海权风潮五百年 /1
- 第二章 棉花、茶叶与鸦片：植物背后的大历史 /19
- 第三章 转瞬即逝的预警：从马戛尔尼到律劳卑事件 /30
- 第四章 攘外安内总无术 /50
- 第五章 巴麦尊的炮舰 /65
- 第六章 中英战力再探悉 /81
- 第七章 头脑中的战争 /95
- 第八章 从相互封锁到白旗风波 /112
- 第九章 舟山惊雷 /123
- 第十章 翻译改写的历史 /137
- 第十一章 最是钦差不自由 /154
- 第十二章 大国战争与小人物外交 /172
- 第十三章 无可奈何广州城 /184
- 第十四章 皇贤侄的抗英奏折 /203
- 第十五章 战火又烧回了舟山 /218
- 第十六章 又一个皇贤侄的登场 /235
- 第十七章 大反攻的悲情闹剧 /247
- 第十八章 到江宁去！ /262
- 第十九章 吴淞口在燃烧 /274
- 第二十章 孤城血泪奈何史 /287
- 第二十一章 不尽长江滚滚流 /306
- 书成琐言 /324

第一章 海权风潮五百年

人类文明史中的水域因素

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历史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所以人们谈历史问题时，总是“必须从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时刻进入它的川流”。^①一部鸦片战争史从何说起，历来是言人人殊。笔者以为，如果不能认清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海权风潮，便难以认清这场战争背后的大历史因缘。而要认清这个海权风潮的来龙去脉，又不能不首先理解水域，尤其是大片水域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按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水域在国家间权力博弈中扮演的是阻碍者的角色。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水域对强国的力量投送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这一点既为美国这样的两翼有大洋屏护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安全保障，但也使之难以将自身的影响力充分施加于其他大陆。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前者；二战中英国在欧洲战场，与太平洋上一些支轴岛屿在亚洲战场上，对美国的价值则反向验证了后者——我们确实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英国这个中转站，诺曼底登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学派则更强调水域的沟通交流作用。比如古希腊城邦之于爱琴海，古罗马帝国之于地中海。水域为前者带来了财富，并丝毫没有阻碍后者攫取环地中海的霸权。最简单的一点，水运的成本远远低于陆路运输，距离越远越是如此。所以沿河、沿海地带在商贸与文明交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相形之下，辽阔的内陆和横亘其间的山岳与沙漠构成了主要的交流障碍。

二者均言之成理，而且都有确凿的历史依据作注脚。这说明历史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讲水域是一回事，从世界文明史和国家间竞争、交流的角度讲水域又是一回事。举凡不同时代不同的权力与资源分布、技术发展程度、主流文化意

识，以及各主要强国的相对空间位置，无不制约着水体作用的发挥。

当我们抛却了自身立场的偏见，重新回到历史中看历史时，就会发现，被重新认识的不仅仅是水体，更是水体之间的文明。

我们把自己居住的星球称为地球。看似平淡，实则大不简单。

事实上，我们的星球大部分为水体所覆盖。陆地，只是少数而已，所以才呈现出美丽的蔚蓝色。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将这个星球称为水球，而称之为地球（earth）呢？

这显然是受到了人类本位主义的影响。因为人类是以陆地而非水体为介质生存的生物，水体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延展性的介质。在交通、通讯技术越是落后的时代，人类的活动对陆地的依附性也就越强，水体构成的阻碍作用也越大。但是，同样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人类就学会了利用水体进行更便捷、更高效的交通与交流。于是就同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局限性，海洋成为长期阻碍各大文明交流的障碍；另一方面，江河却因为人类的努力而成为滋生文明的摇篮。

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古希腊，因为星罗棋布的岛屿分割了水体的连贯性，地中海的风和日丽则为居民的航行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海权强邦的雅典最终败给了陆权强邦斯巴达，斯巴达又败给了新的陆强底比斯，而底比斯和整个希腊城邦集团最终又被更加强悍的陆权国马其顿所征服。此后的罗马帝国虽然是环地中海建立的，但这个帝国的基石却是陆权而非海权。与它隔海相望的迦太基倒是个彻头彻尾的海权中心。可是，三次布匿战争，陆权再次压倒海权。

西洋如此，东洋亦然。

自秦汉大一统以降，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作为陆权文明的传统中国，以王朝循环的特殊形式，始终牢牢控制着东洋世界的大势。这些，早已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老皇历了。何以东洋西洋都如此呢？

原因就出在当时的东、西洋世界同属广义的“农业文明”。当“质”相同的情况下，“量”就成为决定竞争体之间成败的重要可量化追求目标。而在农业文明时代，力量主要依靠人力与畜力，而人力与畜力的数量繁衍都依赖于土地，故而空间尤其是土地空间的大小就直接与国家的强弱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孙子才说：“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形篇》）管子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即以土地空间为力量衍生的基本前提。同样的，孟子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同样是在这个“质”同的前提下，所以空间的大小与数量的多寡才能等同于力量的强弱。

也可以说，传统中国的辉煌，就是建基在这种陆权基础上的辉煌。不应忘记，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中国的GDP总值还是全球第一呢，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不到四亿。今天中国人口十四亿，GDP总值也不过第三嘛。若以人均言之，则居于巴西、波兰、伊朗、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保加利亚之后。

事实上，截止到地理大发现前夕，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陆权为主流的。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起到了巨大的阻隔作用。各大文明就像一块块被水晶罩隔开的花草一样，在相对孤立的地缘环境中，循着不同的理数，发展向不同的未来。它们相互之间虽然也有所耳闻，但始终很少进行亲密的接触。只有很近的文明之间，会发出些出人意料的火花，比如中印的文化交流，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长期斗争。而这些交流的介质主体也不是海洋而是大陆。相对于控制海上要道，陆地的扩张能更快捷、更高效地带来更长久、回报率更高的利益与安全。

直到一连串不经意的变化的相继发生，才使得世界大势的发展逐渐经历了一个由陆向海的转向。

风起东西洋：当中国推动全球化

盛唐时期的中国因为国力的雄厚和民间航海技术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人开始大胆地向远海进军，这一进军就闯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在古代，航海技术的局限长期制约着航海的距离。但是，当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并将之运用于航海后，这一难题得到了跨时代的解决。

今天的读者也经常使用东洋与西洋这两个名词，一般系以前者指代日本，而以后者指代欧美世界。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在古代，中国人长期以来对东西洋的定义却不是这样。要知道，所谓东洋指的是日本、琉球、菲律宾和印尼东部，而西洋范围更大，包括了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西部，并经北印度洋一直扩展到阿拉伯世界。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定义，所以往往简单地认为，这是古人地理概念混乱所致。实则不然。

正如王尔敏前辈在《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一文中精辟指出的那样，这个概念是和罗盘的运用密不可分的。^②

中国古代的罗盘是以天干地支和乾坤交错布列在盘面外缘，形成二十四个方位。其中，定南北之线就是被地理学界沿用至今的子午线。而中国古人扬帆远航，多以福建的金门、泉州、福州为起点，故而在起点处定子午线，线西就是西洋世界，线东就是东洋世界。

正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中国本位色彩的命名和长期传承，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后来这个命名逐渐被新内容所取代，正表明了中国从海洋的后退，更表明了强大的西风的东渐。到近代，西洋专指欧美，东洋专指日本，其表现的实质，正是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相继成为新的强权中心，于是乎，不用他们来争，中国人自己对东西洋的定义和历史记忆便改变了。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再进一步看，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西洋内涵的转移又远远早于东洋定义的改变。这更深一步的表现了历史风潮转移的枢机所在。

那么，中国是如何退出这股海权大潮的呢？说起来很无奈，不是被打出局的，而是自己退出的。

朝贡体系与天朝语境

要理解中国的出局，必须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朝贡，一个是天朝。

中国的朝贡体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当时的朝贡体系，是封建格局下，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维系天下和平与政治运作的重要形式。诸侯因中央天子的册封而获得合法性，并通过周期性的朝贡反向加强天子的共主地位，最终达成一种万邦和谐的互利共存。

待到秦汉建立大一统王朝，郡县制成为新的内部制度，朝贡体系始逐渐外转，一步步演变成为一种独特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这个向外转的过程中，陆权时代的以大为强赋予了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传统中国才可以恩威并用，将周边国家纳入朝贡体系中，中国赋予后者以合法性，后者则通过承认中国的共主地位获得与中国贸易的资格。这样就产生了宗主与藩属的关系。

从政治上看，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对周边藩属国的内政并不取干涉姿态，而只是在诸如新君即位，策立世子，国君、国母寿诞等场合出现，给予一种法体的确认。而当藩属国遇到自身难以摆平的难题时，宗主国尚要施以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支援。如明之援朝抗日，清之代越南剿匪，都是显著例证。当藩属国官、商、民在中国境内遭遇“风难”时，中国还要为其提供抚恤。

从经济上讲，中国虽然接受着藩属国的朝贡。但这朝贡只是藩属国献给中央之国大家长的象征性礼物，不具有如西方殖民地税收性质的经济意义。同时，中央之国的君主往往还要回给进贡者昂贵得多的礼物，并且给予藩属国到中央之国贸易的特权。此外，在相互交往中，中国也很注重不让小国、外藩为难。比如，道光十八年初，御史帅方蔚揭陈，出使琉球的使节的家丁及福建省派往护卫的官兵，往往趁机“携带内地货物”，

或“包揽商货”，到琉球“昂价勒售”。道光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认为“甚非体恤外藩之意，且与中国体制有关，不可不严行查禁”。所以他在二月初四密饬闽浙总督“认真稽查，如使该使臣家丁竟有携带货物情弊，即饬令该使臣自行惩办，并遴派大员，于开船时留心查察所派弁兵。如有违例私带及包揽商货，著即按名查拿，分别惩究，毋稍姑容，以除陋习而免扰累”。^③这最后三个字“免扰累”显然指的是免去琉球的备受扰累。后来，使节团中的一个游击在琉球病故，琉球花了五百两白银的丧葬费，道光事后还别忘了给琉球送回去。^④

上述种种情势，近代西洋列强以其殖民地眼光审视，自然以为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虚景。其实，“虚景”的背后，也自有其实质。

首先，中国根据地缘战略的原则排定周边藩属国的重要次序，然后对其内政外交作宏观的把握，以使之成为中国的地缘屏障，从而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此即古人所谓“守在四夷”。

其次，传统中国以实力为基础，以互市为利饵，吸引尽可能多的国家与部落加入这个朝贡体系，也就维持了东亚的和平，并在和平中，温和、有序地推动一种集体的、人文的生活进步，使儒家四海一家的理想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了。

在唐太宗时代，由于中国的文化多彩、政治昌明、商业繁盛、军力强固，周边政权心悦诚服，竟共推大唐天子为天可汗，视长安朝廷为天廷，相应的中国王朝也就成了“天朝”。换言之，天朝不是中国自封的，而是周边政权共同推举出来的。而“朝贡”就是周边政权对“天朝”的最佳承认方式。到清朝，这一情形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武功标准衡量，清朝确实是武功鼎盛、疆土广阔。不仅将朝贡体系再次确立起来，而且发扬光大。但另一方面，清朝在软权力继承领域却发生了巨大的倒退。

作为一个从边远地区入主中原的征服王朝，满清政权自始就面临着一个统治合法性的困扰。说起来中国人自古就不以血统和外貌作为划分彼此的标准，更没有什么种族与民族的褊狭意识。孔子赞扬管仲，也不过说因为管仲的尊王攘夷使大家不用像蛮族那样“披发左衽”，其区分的关键在文化的高低，不在种族的同否。又如唐太宗，从血统上就不是纯正汉人，但汉人从不把这一点当作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孟子早就说过：“舜，东夷人之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宋儒陆象山说，东海有圣人出，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文化传统。也可以说，中国人自古重家、国，轻种、族。岳飞抗金，抗的是金国，不是女真族，他保的是宋国，也不是汉族。他力行“尽忠报国”，却从没说过要打种族战争。

如果清廷果能虚心自信，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多彩的中华文明，并进一步平和地对

待全球各地的异质文化，则盛唐第二就在眼前。五洲列国，岂容英吉利独大称雄？而汉人自然也不会强迫旗人不穿旗袍马褂，更不会强迫他们不留辫子。可叹满清权贵集团褊狭地把自己定为一尊，强迫汉人换发型、改衣帽。并且极度敏感于被说成“夷狄”，故而屡兴文字之狱。所有这些都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活力，也败坏了中国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但是，清廷缺乏现代专制国家的技术手段，所以要在广土众民之上，对知识阶层厉行全面控制，非常不容易。清廷的办法是通过将科举制度与从政的前程紧密扣合的做法来垄断资源分配，再通过控制科举制度控制士大夫阶层。士人前来考试，必须变异发型、服装，并接受官方的价值观，如若不然，则来考试无异于自投罗网。如不来，就被排斥在资源圈之外（我们要知道，很多所谓书香门第，其地位维系全靠后世子孙在科场上不断进取），甚至会遭到清廷的主动打击。

清廷不仅把文员的前程与科举制度严格捆绑，对武人更是严格限制。如果没有文职身份，则武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相形之下，无论是盛唐时期的出将入相，还是狄青行伍出身，靠战功位列枢府重臣的往事，在清朝都是不可思议的。

时日久长，清廷更大言不惭地将这种社会资源的垄断方式视为当然，而且自有一干名人甘心做御用文人，为之张本。君不见，钱谦益（牧斋）对新朝略有异议，便有人说，你足践大清之土，口茹大清之毛。就不要再“讪辞诋语”了吧。对此，陈寅恪先生点评道：“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⑤但是，大清却一贯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这个“优良传统”发扬了下去，后来，所谓“食毛践土，具有天良”竟成了清朝公文中的惯用语。总之，你们在我的地盘上，领我发的俸禄，自然该对我具有天良。还发什么牢骚？但清廷从来不问，发出去的俸禄从何而来？更不会承认“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古训了。

在国政治理上，清廷同样拿不出高明的政治架构，所以只有继承明朝残破的专制政体，却改变得更为恶劣。朱元璋废宰相，已经很糟糕，但此后明成祖创设内阁制度，仍有补益。清廷将权力中枢从内阁转向军机处，问题就严重了。在明朝，内阁大学士尚且多是硕学宿儒，有些更是皇帝小儿的老师，潜实力不容低估。到了大清国，所谓军机大臣在法理上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皇帝口述最高指示，这些人跪受笔录，一帮奴才而已。或许，清朝最大的改良就是非常注重对皇储的培养和选拔，所以从康熙到道光，基本上都是文武全才，精力充沛，高度勤政。但是，制度的缺陷不改变，光靠皇帝一个人带着一帮跪受笔录的老秘书，又怎么可能治好国家呢？

当然，满清权贵集团也深知，光靠对内高压，是难以长期维系其专制政权的。要想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就是内部问题外部化。化的途径又有两条：一是“天朝”身份的

强调；一是“蛮夷”概念的外转。前者的目的在于，以“天朝”的荣光证明满清权贵集团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后者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将外国人定义为蛮夷，自然闪避了满清自身的蛮夷问题。不仅如此，将外国人定义为蛮夷之邦、犬羊之性，而我大清是天朝上国，华夏贵胄，这样就又给了所有臣民（无论满蒙汉回藏）一种虚拟的自尊心，从而淡化了满清政权对内的专制性，更淡化了被奴役的国民们的奴才身份。真可以说是一石数鸟。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扭曲了中华文明多元、宽容的大传统，而开启了一个褊狭、激烈的小传统。又由于外向的“天朝”尊严被和内部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密切捆绑在一起，这就使原本只是“虚”的概念的“天朝”，在清朝成为对外交涉中“实”的核心。甚至不惜牺牲实际利益，也要维系住天朝的体统与礼仪——非如此，难以内部伏众也。

在这种语境下，满清朝廷最害怕的就是反清势力在海外建立基地，故而对国人出海作了种种严格限定，同时虽然注重对外贸易的展开，却轻忽中外文化的交流（详见本书第三章），终于使中国逐渐从海权大潮的一线退出。

一转眼间，上苍便把绘制第一张世界地图的殊荣，给了欧洲人。

也可以说，正是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现，祸福参半地彻底改写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大势。

全球时代的到来和海权的崛起

地理大发现扫除了长期笼罩在各大文明间的黑幕。全球地图的轮廓逐渐开始浮现在人类文明的视界中。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一场巨大的转变。

伴随着这张世界地图，产生的是一个空前广大的世界市场。现在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才能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新强国之路。

得风气之先者就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但是两国起步仍嫌过早。两国的武器制造水平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势。当他们来到东方时，惊讶地发现，当地人对火器的了解与运用，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而西、葡都是小国，中、印却是庞然大物。

如果说两国有什么优势的话，优势就在于海权。在此之前，海战的通行模式是跳帮战以及特殊情况下的撞击战，一切火力战都是为最终的夺船奠定基础。海战在这里变成了另一种陆战。相对于击沉对方的战舰，更重要的是夺取战舰。可是，西、葡两国的海军虽说也进行跳帮战，但却同时将火炮的位置大幅提升，开始尝试以击沉敌舰为目的作战。再加上两国对世界信风体系的突破性认识，他们虽不能用坚船利炮撞开东方的大门，却

不妨碍他们在传统的陆权大国的权力边缘建立海洋帝国。最终在美洲与南洋土人的面前，耀武扬威，大搞起种族屠杀来。

其次，从经济上看，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热衷于从海外掠取贵金属，但不注重自身制造业的发展，而沉迷于消费。结果就是它们越有钱，国内市场被外国商人占有的程度越彻底！

再次，当时西、葡两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均不上轨道，他们从海外掠夺来的贵金属，相当部分被用于皇室消费，这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真是利莫大焉，但西、葡两国却也不免因此而注定了为他人作嫁衣的命运。内部制度建设的滞后造成腐败的滋生。利益的增长无法赶上走私、贪污与挪用公款的增长。结果，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王室正是在其从美洲的白银输入量达到顶点时宣布了财政破产。葡萄牙王室也同样在商业繁荣中走向了靠借贷维持运营的悲惨局面。

最后一点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从地缘环境上讲，两国都是欧陆国家，所以海洋只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却无法带来安全。相反，他们既要提防新兴海强的崛起，又要防备欧陆邻国的陆路入侵，而无法倾国力于一个战略方向。两国既不能产生现代海权文明，攫取海权式的世界霸权也就更谈不上了。

但与两国一水之隔的英吉利就不同了。英吉利是个岛国，所以海洋不仅能给它提供财富，更能给它带来安全。只要它能控制海洋，就是同时控制了利益与安全。随着控制水体范围的扩大，它的财富与安全值也就不断增加。这个地缘上的优势，是西、葡两国所无法企及的。

西班牙看到了这种前景，于是组建了空前庞大的“无敌舰队”扬帆远征英吉利，想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但英荷联军的英勇抵抗，再加上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最终葬送了“无敌舰队”。这可真是西洋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富勒将军以其如椽巨笔所写的那样：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也许在1588年，对这一点还并无太明确的认识，可是在下一个世纪，这个耳语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响，终于成为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声。

所以，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这样的：它为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使英国人获得了西班牙所丧失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对于其国运所具有的信心，促使英国人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最后他们的旗帜飘扬在世界之上，成为亘古以来所未有的海洋大帝国。这个帝国从兴起到衰颓，差不多经过了三百年以上的时间。^⑥

但讽刺的是，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却未能及时意识到这个历史机遇的存在。她觉得开支已经够多了，该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为了省钱，她不仅没有扩建海军，反而连现有海军的维系经费也是一拖再拖。于是战舰锈坏，船员尤其是那些战争中伤残的船员们，竟陷入衣食无着的悲惨境地。英国人终将意识到，这次贻机造成的时代裂痕，将用后来一个世纪的尸山血海来填补。

相形之下，西班牙的主政者菲利普二世倒是气度恢宏，他将这次挫折看成是上帝对他的考验，而未迁过于任何人。他宽容了将军，善待幸存归来的士兵，新的战舰也开始建造。但是，帝国已经越来越难以聚合起重建一支无敌舰队的财力了。

结果就是，英国不愿，西班牙不能，荷兰遂得以坐享渔利，顺理成章地大肆扩张海上力量。不知不觉竟成了世界范围的“海上马车夫”。一个新帝国的轮廓也就在这海权的扩张中渐渐成型。

由海向陆：大英帝国的崛起

但荷兰与西、葡一样，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地缘局限性。它与陆强国家之间缺乏自然地障的保护，而离海权的英国又太近。结果，它既是陆强之间角力的战场，又是陆强挑战海强的跳板，还是海强制衡陆强的前哨。这就注定了荷兰无法置身事外。而其狭小的国土，和人口与资源的先天不足，更严重限制了它的发展。

相反，英国自克伦威尔以降，逐步确立了以海权争国权的国家战略。从1652年5月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到1674年2月17日，英荷在伦敦签署《第二次威斯敏斯特和约》，标志着第三次英荷战争的结束。荷兰人倒是赢了三次战争中的两次。但就在这军事的胜利中，荷兰的国势却不可逆转地一步步走向了衰落——因为它无力同时应付陆强的法国与海强的英国。最终，它只能靠仰赖英国的鼻息，换取欧洲均势中的生存。就这样，荷兰变成了海权强国制衡大陆的一粒棋子。

而海权战略也正是在英国人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此前，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荷兰，都没有超越由大陆向海洋的传统模式，这既因当时的技术限制所致，也是由他们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而英国则不同，英国是第一个由海外望大陆的超级强权，这种视野的不同，造就了完全不同的国家战略。

要知道，在当时要建设一艘一百九十英尺，装炮一百零四门的一等战舰，要用两千棵橡树，造价达十万英镑。当然，建成后的火力也是惊人的，一次弦侧齐射就要消耗半吨左右的铁制炮弹，在农业文明时代，这是惊人的火力。为了维持庞大的海军，大英帝国的国债从1700年的一千四百万英镑增加到1815年的七亿英镑。此种财政负担，转换到

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身上，都是不可思议的——试想，一个大陆国家，为了一支装饰性的海军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承受财政上的巨额负担，对它的人民而言，对它的贵族而言，意义何在？

诚然，君主可以用这支海军作海外扩张，但这必然与英国发生直接冲突，而同时来自大陆敌国的陆上威胁，却无法靠海权解决！两线作战的难局，困扰着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生产力水平无法支撑海陆双强国家的发展。这就是英国独强的又一个奥妙所在。

所以，大陆国家的君主中，虽然也屡有重视海权者，但却无一成功。如太阳王就是其中一位，1661年，当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亲政时，法国海军只有二十艘军舰；到1677年法荷战争接近尾声时，法国海军已经拥有二百七十艘战舰了。但是，他太过咄咄逼人的战略，引发了欧洲的集体反制，使之到头来，既没有统一大陆，又失去了海洋。

十八世纪中期的几场战争，更深层地暴露了法国的地缘尴尬和战略决策失误。在1740年到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一方面大规模卷入中欧陆战，一方面又要承担沉重的海外义务，后者又分别包括了如下三个任务：

- （1）保护海外殖民地；
- （2）为海外商船队护航；
- （3）对英国的商船队展开袭击战。

结果就是“搏二兔不得一兔”。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虽然双方各损失了大约三千三百艘商船，但英国因后备力量雄厚，其海权优势未遭动摇，法国的海外贸易却损失惨重。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既没有获得中欧霸权，反而失去了加拿大与印度，被英国从根本上重创了波旁王朝的霸权基础。

同样的尴尬也存在于拿破仑身上。虽然后者几近统一了欧洲，但终于还是不免功亏一篑，败于英国。

但是，如果把大英帝国的霸权单纯归结为海权的胜利，又不免过于偏颇。须知单纯的海权本身没有意义。英国的成功首先有赖于两个战略的结合，那就是海权战略与均势战略的结合。而要理解英国式均势战略的出现与成为一种传统，我们首先要对欧洲的权力斗争史有一个概略的理解。

欧洲大棋局：帝国语境的形成

自罗马帝国瓦解后，虽然屡有统一的尝试，但欧洲终于没有像中国那样再次大一统，而是走向了持久分裂的局面，即形成了一种多元并峙的政治格局。其初始的原因，大致有下列三项：

（1）支离破碎的地貌不利于统一管理。

（2）国家本位主义至上的重商主义贸易，导致市场的闭锁性，排斥统一性帝国。

（3）军事技术持续发展，但带有开放性，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靠军事技术的垄断统一欧洲。

这样一来，在国际领域，形成的就不是洛克式的契约共同体社会，而是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不存在国际政府，所以主权在国家这个层面上一度变得不可分割、至高无上。就算国家间可以制定出类似于国内法的国际公法，也找不到强制性的暴力仲裁机构。这样一来，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去竞争。这就是“自救原则”。这样一来，国际关系就和国内法制前提下强调道德范式的人际关系，产生了本质的区别。

当然，现实世界并非绝对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制度与国际贸易时刻在减少着摩擦，校正着纯粹的权力竞争。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世界本质上仍是一个无政府社会，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军事性安全竞争的无政府体系。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相对于奉行零和原则的军事竞争，国际经济交往却可以带来共同繁荣，此即双赢。但是，绝对公平的收益是不存在的，每一次经济上的互惠总会有一个相对的获利大者。而近代化以来，一国的军事实力越来越与经济实力关联密切。而且我们也越来越难于区分军备的攻击性与防御性。这样一来，主权国家因担心自身安全和地位受到削弱，有时宁肯放弃一些国际商贸上的利益，也不敢冒削弱军事实力的风险。在这里，国家关注的是多国体系中的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无政府世界里，逐渐形成了竞争性的文化环境，并衍生出三种截然不同但又互相影响的国际政治观。

第一种是以东普鲁士的康德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这一派产生最晚，在十八世纪才成型，强调以道德约束国际关系，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和平。在西方长期作为边缘理论存在。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对国际关系产生实质性的校正与影响。

第二种是以荷兰的格劳修斯为代表的国际法学派，形成于十七世纪初，注重国际法

的构建与运用，强调国与国交往的法理运作。长期沦为对强权政治的文饰和对既成事实的追认，其最佳的运作也不过是在技术层面缓和了国家间的权力角逐而已。

第三种是以古希腊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源头，以法国首相黎塞留、英国学者霍布斯为代表，而最终以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为标志形成现代大学学派的现实主义学派。这一派产生最早，影响最大，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个传统，一个历史实践。其中黎塞留虽未留下严谨完备的理论著作，但却铸造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欧洲传统，这就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思维。

黎塞留较早意识到，民族国家将成为欧洲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所以与其执迷于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束缚，不如理性地追逐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他本人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但他认为这只是他个人的信仰，作为法国的实际执政者，他首先应对“国家”而不是教会负责。

他又意识到在当时那种多元并峙的环境中，很难再重现罗马式的大一统。所以国家利益的追求也应有其限度。能够构建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国际权力平衡，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这就是欧洲现实主义式均势战略的滥觞。

在这个思维的指导下，黎塞留大胆地支持宗教信仰上的异端——新教势力，甚至是异教徒的土耳其人，削弱和自己信仰相同的哈布斯堡王朝，使中欧陷入持久混战，无限期推迟德意志的统一。法国则静待大家都筋疲力尽，再加入战争，趁机向自己心目中的地理边界顺利扩张，逐步确立了法兰西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黎塞留的这一套战略观虽然一开始备受争议，但最终被欧洲列强所接受。这就形成了下述三大指导原则：

第一，决定一国行为的动机是安全与利益（尤其是安全）追求，而非其他，尤其不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非理性因素。

第二，欧洲呈无政府状态，各国势均力敌，且各有难以弥合的地缘缺陷，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普世性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追求霸权，而不能妄图建立一元化帝国。最忌讳的就是野心超出国力和地缘的极限，从而引发国际性的反制行为。故而应使各国互相制约，实现最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平衡，此即均势体系的确立。所以各国之间相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压倒观念之分歧；力量和资源的分布变化对国际关系之影响，胜过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之同否。

第三，对于有资格问鼎霸权的国家而言，均势必须有利于本国，不然就要等待时机，瓦解现有均势，构建新的地缘战略格局。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欧洲列国一起迅速走向追逐权力（Power）的霸权争夺道路。在这个格局中最成功的国家不做“天朝”，而是要做Great Power。

Great Power，直译就是“伟大的权力”，引申为“多元无政府体系中的强权中心”，它是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欧洲作为一个外交术语逐渐广为人知的。它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强，一个是强而追逐权力并成为强权中心。（关于Great Power的辨正，详见本书第七章）正如曾两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伯爵所言：“这是一个帝国，当他崛起的时候，你的子孙也随之显赫，他们不仅将赢得同胞的尊重，还要让全世界肃然起敬。”所以他老伯爵才又说：“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利益。”

这就要求国家要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多层面进行持续性变革，保持充满力量的状态，去塑造最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并随时准备着为捍卫这一体系而战。每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认真面对军事技术的革新与邻国的改革。如果反应迟钝，结果就是淘汰出局，甚至惨遭灭国亡种的危机（如波兰之被瓜分，欧洲列强早期在殖民地搞的种族屠杀和后来希特勒在欧洲内部的大屠杀）。即一国之军事变革，会迅速引发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这就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冲击—回应”模式。^⑦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技术的发展持久而带有开放性，军事力量直接决定一国的国际地位，于是国家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发展工商业，为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与财政支持，而军事力量的提升又反过来为国家在更大的空间内发展工商业提供了强权保障。于是军事技术在西方得到一种高速度的累进性发展，军事上的需求又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连达尔文也设计过机枪、蒸汽战车、潜水艇和空降士兵，并思考如何通过城堡设计的改良，抵消火炮的威力。这种景象在世界其他地区是难以想象的。

久而久之，这就在欧洲列强的国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事—商业—工业复合体”型社会^⑧。时日久长，虽说欧洲国家之间军事水平相当，但却不免与非欧洲国家之间产生了一个质的差别。工业革命的产生，算是将这差距定格下来，从而为欧洲的扩张提供最强有力的基础。

对此，杰弗里·帕克在其主编的《剑桥战争史》中，曾有如下近乎“自白书”的精彩论述：

发展新的作战技巧和策略，不仅需要作战技术的改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了维系以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军事体制，必须承担高昂的财政开支。而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大量人力动员获取力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体制而言，则只要动员起大量以传统兵器武装的成年男子就足够了……而资金密集型的军事体制则要求为士兵准备全副的武装——这些武器不仅花费巨大，而且很容易落伍。但后者（注：指资金密集型的军事体制）却更有吸引力，因为虽然该体制构建时期花费较大，但后期保养